

中国武术古籍东传与朝鲜汉文武籍的编撰

蔡艺^{1,2}, 赵剑平³, 张银行⁴

(1. 福建师范大学 体育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福建 福州 350108; 2. 湖南工业大学 体育学院, 湖南 株洲 412007; 3. 湖南学院 体育学院, 湖南 郴州 423000; 4. 扬州大学 体育学院, 江苏 扬州 225127)

【摘要】: 域外汉文武籍研究是清晰中国传统武术文化传播路径和武术交流史的重要参考。为呈现朝鲜汉文武籍编撰的历史脉络及其与中国武术古籍之间的关联, 经由古朝鲜史料的文献学分析和历史考证可知: 朝鲜汉文武籍编撰与中国武术古籍的东传息息相关。朝鲜汉文武籍编撰经历了从引入到模仿, 由模仿至创新, 因创新而独特的发展历程, 而这一历程可以从中国武术古籍东传的历史坐标中得以洞见。中国武术古籍与朝鲜汉文武籍关系的明晰, 深描出朝鲜为提升士兵武艺技能对中国武籍展开的慕求, 亦反映出明清时期中国武术发展的成熟及其对周边国家的影响和辐射, 从而明确了中国传统武术文化在东亚地区的源头地位, 为中国武术传播史、中朝武艺交流史、东洋武艺史等相关研究提供借鉴。

【关键词】: 武术史; 中国武术古籍; 朝鲜汉文武籍; 《武艺诸谱》《武艺诸谱翻译续集》《武艺图谱通志》

【中图分类号】: G812.9, G85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2096-5656(2021)04-0059-07

DOI: 10.15877/j.cnki.nsic.20210702.005

日本史学家西嶋定生指出,“汉字、儒教、佛教和律令制度, 构成了东亚完全不同于西方的特点, 而汉字则是最为基础的支柱。”^[1]20世纪以来, 域外汉籍研究方兴未艾, 在这些弥足珍贵的域外汉籍之中, 亦有汉字书写的武艺书籍, 特别是朝鲜王朝时期(“朝鲜王朝”是指1392年由李成桂在朝鲜半岛建立的政权, 为区别现在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学界亦将其称为“李朝”或“朝鲜王朝”。本文所指“朝鲜”, 即朝鲜王朝, 以下简称“朝鲜”)编撰的《武艺诸谱》《武艺图谱通志》等书, 保存了丰富而又珍贵的中朝武艺交流信息。然而, 国内虽有马明达、周伟良、袁晓辉等做过一些卓有建树的研究, 亦有关于《纪效新书》《练兵纪实》等中国武术古籍东传朝鲜半岛对朝鲜武籍编撰产生影响的相关成果, 但未能呈现中国武术古籍影响下朝鲜汉文武籍编撰的历史全貌。韩国学界也对朝鲜汉文武籍编撰的历史进行过梳理, 但囿于汉文水平, 难以透达深处。本文旨在通过对中国武术古籍东传与朝鲜汉文武籍编撰之间关系的系统梳理, 勾勒出基于武籍传播所形成的

中朝武艺交流史, 从而将中国武术文化置于更为广阔的历史向度进行审视。

1 从引入到模仿: 壬辰倭乱时期(1592—1598年)朝鲜汉文武籍编撰的尝试

1.1 壬辰倭乱与十四卷本《纪效新书》的引入

作为中国一衣带水的邻邦, 朝鲜在文化上效慕华风, 素以“小中华”自居。书籍是朝鲜继续正统, 实现“威仪共秉周家礼, 学问同遵孔氏书”的重要媒介。正如朝鲜中宗所言,“书籍之藏, 其来尚矣。有志致治者, 莫不以斯为重, 盖圣贤之立言垂教, 历代之治乱兴亡, 俱在于斯。”^[3]中国与朝鲜半岛的书籍交流虽历史悠久, 但两国武籍交流直至明末清初才得以繁盛。一是,“宋元以前的武术古籍, 只有少量

收稿日期: 2021-04-25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9BTY110)。

作者简介: 蔡艺(1979—), 男, 湖南攸县人, 博士, 教授, 研究方向: 体育文史。

通信作者: 赵剑平(1984—), 男, 湖南郴州人, 博士, 讲师, 研究方向: 武术史。

射箭图书幸存焉,其他的兵械武术图书基本上一无子遗,明以前古籍如《角力记》真是凤毛麟角。”^[4]明代中后期,一些军事著作中才有关于武艺的记载,如《武编》《纪效新书》《武备志》等。真正意义上的武术图书,如《少林棍法阐宗》《单刀法选》《长枪法选》等,在明代晚期才得以出现^[5]。二是,中朝书籍交流的主体是宣扬儒家教义与礼乐制度的经籍,兵书属于禁传之列。“且天文、历法、兵法等书,乃中朝所禁,礼部若闻求贸册名,则不当并录他书以示,故别录以启。”^[6]。

壬辰倭乱的爆发,为中朝武籍交流创造了契机。战事之初,朝鲜溃不成军,明军援朝,祖承训所率辽东军初战不利,李如松担任主将后方扭转战局。平壤大捷后,朝鲜宣祖问及明军前后胜败之异,李如松直言:“前来北方之将,恒习防胡战法,故战不利。今来所用,乃戚将军《纪效新书》,乃御倭之法,所以全胜也。”^[7]宣祖听闻如获至宝,旋即新设训练都监负责操练事宜,按照“同衣甲、同器械、同技艺”的原则进行操练,作为凝结浙兵操练精髓的《纪效新书》,自然成为朝鲜翘首跂踵的对象^[8]。

然而,朝鲜引入《纪效新书》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平壤之役后,宣祖曾提出观瞻《纪效新书》的请求,或许是忌惮“禁传兵书”之规约,李如松并未应允。朝鲜只能另辟蹊径,“密令译官,购得于都督麾下人。”^[7]《纪效新书》经历了十四卷本(嘉靖三十九年,1566年)、十八卷本(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十四卷本(万历十二年,1584年)的编撰过程^[9]。就时间上而言,这3个版本的《纪效新书》在平壤战役(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前均已成书,皆有东传朝鲜的可能。据韩国学者考证,朝鲜购得的这部《纪效新书》只是摘要本^[10]。“戚继光所撰《纪效新书》数件,贸而得来。但此书有详略,须得王世贞作序之书贸来。”^[11]

王世贞所书序跋,“为隆庆三年(1569年)李邦珍翻刻于河南的十八卷本所移录,李在序言中说,他是戚继光寄来的本子为底本的,足见王世贞作序的本子必为十八卷本无疑。”^[12]就武艺层面而言,十八卷本与十四卷本的主要区别在于前者载录了《拳经》篇,后者则没有^[13]。而朝鲜在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以《纪效新书》为蓝本编撰的《武艺诸谱》亦无拳法内容,其原因是“本图所载,只钹、刀、棍、

牌、枪、笏而已”^[14]。综合以上史料可以推断,朝鲜最初购得的《纪效新书》应为十四卷本。

1.2 《武艺诸谱》:模仿十四卷本《纪效新书》的产物

在浙兵作战体系中,鸳鸯阵是短兵相接时的御倭阵法。鸳鸯阵远以火器、弓弩作为掩护,近则以长短兵器配合作战,其阵形、长短兵器配合与瓦氏“岑氏兵法”有着很深的渊源^[15]。鸳鸯阵中使用兵器的士兵被称为“杀手”,互救依存的关系要求杀手武艺必须灵活精炼,故其操练最需时日。“砲手、射手,所谓不过一举手之劳耳。练兵工夫,则专在杀手上。”^[16]朝鲜慕习《纪效新书》的态度非常积极,兵曹判书李德馨主张:“今此各样武艺,用剑用枪之法,能中《纪效新书》规式者别为论赏,立试于科举,以变沈痼难改之习。”^[17]对将士习练浙兵武艺的效果,也会通过严格的奖惩制度进行督促。

然而,《纪效新书》皆为汉字所书,内容繁复且难以晓读,导致“今杀手各兵,虽解枪笏,而知谱鲜少。”^[18]加上《纪效新书》“多用方言,支蔓重复,未易究竟。且武艺有图无谱,阵法散出不备。”^[19]更加坚定了朝鲜编撰本国武艺教材的决心。

针对杀手的武艺教材编撰经历摘录、翻译、增补3个阶段,先后刊印了《杀手诸谱》《杀手诸谱谚解》,最终定本《武艺诸谱》。《武艺诸谱》的编撰工作始于对《纪效新书》的删繁化简。韩峤从《纪效新书》中摘抄出棍、藤牌、狼笏、长枪、镗钹、双手刀等6技撰成《杀手诸谱》。“此谱初成于甲午之岁。”^[20]故被后人称为“甲午本”(1594年)。《杀手诸谱》成书后,宣祖又下令对其进行翻译,中朝文对照本的《杀手诸谱谚解》于次年得以刊行。此后,朝鲜于乙未年(1595年)再次对《杀手诸谱》进行修订,将长枪十二技增补为二十四技。乙未本之后,韩峤又相继增补“许游击答问”“筹海重编交战法”两章。宣祖三十一年(1598年),《武艺诸谱》付梓,成为朝鲜此后百余年杀手操练的重要教材。

《武艺诸谱》是由汉字书写而成,附有朝鲜文翻译,分为棍谱、牌谱、笏谱、长枪前谱、长枪后谱、钹谱、剑谱、许游击答问、筹海重编交战法等9个章节。就内容和格式而言,《武艺诸谱》是对十四卷本《纪效新书》的模仿。首先,《武艺诸谱》对兵器制式的介绍基本出自十四卷本《纪效新书》,只是对其内容

进行了精简。其次,《武艺诸谱》的势法数量、名称与十四卷本《纪效新书》几乎雷同,只是在顺序上存有差异。最后,其“兵器制式”“谱”“诸势总图”的编纂格式,亦参照了十四卷本《纪效新书》。此外,《武艺诸谱》势法图完全是以十四卷本《纪效新书》为参照依葫芦画瓢,动作形态基本一致。对此,朝鲜史书给出了如下评介:“(《武艺诸谱》笔者注)所载棍棒、藤牌、狼筅、长枪、镗钹、双手刀六技,出于戚氏新书。”^[21]

2 由模仿至创新:壬辰倭乱之后(1599—1610年)朝鲜汉文武籍编撰的突破

2.1 十八卷本《纪效新书》《练兵实纪》与《万宝全书》的东传

宣祖三十一年(1598年),壬辰倭乱以日本战败落下帷幕,然而朝鲜对中国武术古籍的慕求并未因此中断。壬辰倭乱之前,朝鲜“从古所传只有弓矢一技,至于剑枪则徒有其器,原无习用之法”^[22],武艺理论之匮乏可想而知。壬辰倭乱结束后,随着明军班师回国,朝鲜提升士兵武艺技能最有效的方式就是从中国武术古籍中参悟武艺精髓。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十八卷本《纪效新书》《练兵实纪》《万宝全书》等武术古籍相继东传朝鲜。

十八卷本《纪效新书》传入朝鲜的时间在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左右。据《朝鲜王朝实录》记载,宣祖曾言“打拳之事载于《纪效新书》,亦是武艺中一事,似当观之。”^[23]十四卷本《纪效新书》未收录拳法,由此可以推断,朝鲜当时已经获得十八卷本《纪效新书》。据史料记载,援朝明将戚金(戚继光之侄)在回国之际曾将《纪效新书》作为礼物赠送给朝鲜,“往年以兵革,从事贵邦,得接光仪,足慰平生至原。……但倭贼情形不测,金亦知有变诈状,故临别时,以《纪效新书》为别后赠,欲贵邦知此书而教此法,富国强兵以拒贼耳。”^[24]

朝鲜史料关于《练兵实纪》的记载最早出现于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前日内下《纪效新书》八册、《练兵实纪》九册、《倭情备览》一册,合十八册。”^[25]与抗倭技法相比,《练兵实纪》增设了骑兵,鸳鸯阵也调整为“藤牌为第一,双篋筩为第二,双刀棍手二双次之,钹手一双居后。”^[26]除此之外,明朝末年出版的通俗类书《万宝全书》也得以东传,与

十八卷本《纪效新书》《练兵实纪》一起,成为朝鲜编撰《武艺诸谱翻译续集》的重要参考。

2.2 《武艺诸谱翻译续集》:朝鲜汉文武籍的创新之作

十八卷本《纪效新书》以及《练兵实纪》《万宝全书》等中国武术古籍的相继东传,为朝鲜再度编撰武籍创造了条件。宣祖三十七年(1604年),训练都监开始编撰《拳谱》。朝鲜之所以单独编撰《拳谱》,是因为拳法虽无预于大战,“然活动手足,惯勤肢体,此为初学人人艺之门也。”^[27]就“今见内下《纪效新书》,则用旗之节、作战之法颇似完备,又以拳图迫入于卷末……而《拳谱》亦令据此撰定矣”^[25]的记载而言,《拳谱》的主体内容出自十八卷本《纪效新书》。故《拳谱》在严格意义上并不能称之为“武籍”,而是以十八卷本《纪效新书》“拳经捷要篇”为基础的摘抄本,是《武艺诸谱翻译续集》编撰的前奏。

《武艺诸谱翻译续集》的编撰过程和历史背景,其跋文予以了交代。“顷在庚子年间,我先王下教都监,使以中国技击之法作谱传后,都监祇承聖教,遂即撰进,所谓《武艺诸谱》是已。第是谱之撰,实据新书本图,而本图所载,只钹、刀、棍、牌、枪、筩而已。其他大拳、偃月刀、钩枪、倭刀诸技,则不载于本图,故其所撰止于钹、刀等技,而大拳、偃月诸技,则未之及矣。还甲辰秋,臣卢稷方为提调,以为各艺比较之际,其无谱可据者,久必传失其真已。付前谱之手,使之并谱其未谱之技,而适于其时,先王以新书闽本得诸天将者,下之拳谱五十,亦载其中,即戚将随后撰入,而初不载于本图者也。于是既依闽本撰次,又得唐本《赛宝全书》中宋太祖拳法三十二,参互考证,补其阙遗,名为《武艺诸谱续集》,而缮写继进。”^[14]由跋文可知,该书是作为《武艺诸谱》续谱编撰的,原本命名《武艺诸谱续集》,或许是成书后附有朝鲜文谚解的缘故,最后定名《武艺诸谱翻译续集》。之所以编撰此书,是因为此前的《武艺诸谱》并未收录拳、偃月刀、倭刀等武艺。此书的编撰始于甲辰年秋(1604年),闽本《纪效新书》的传入为该书编撰创造了契机。朝鲜先行编撰《拳谱》,又以《赛宝全书》所载拳法参互考证,增补其他武技,历经7年时间而成。《赛宝全书》或为《万宝全书》,《武艺诸谱翻译续集》中,有“又得唐本《赛宝全书》中宋太

祖拳法三十二参互考证”的记载,但中韩两国数据库并无《赛宝全书》的任何蛛丝马迹。明代武术文献《万宝全书》与《赛宝全书》仅一字之差,且时间上存有传播可能,故推测《赛宝全书》或为笔误。笔者将在“从‘模仿’到‘创新’:基于《武艺诸谱翻译续集》的中朝武艺交流史研究”一文中予以考证。

与《武艺诸谱》浓郁的模仿气息相比,《武艺诸谱翻译续集》更具创新意识。其拳法虽脱胎于《纪效新书》,但朝鲜并不满足于简单的模仿,而是参鉴《万宝全书》等中国武术古籍,在《纪效新书》三十二势拳法基础上衍生出四十二势。除此之外,《武艺诸谱翻译续集》所辑青龙偃月刀、倭刀、夹刀棍等武艺,在中国武术古籍中均无详细记载,其势谱多为朝鲜新创。如倭刀,部分势法源自《纪效新书》棍谱。而倭刀之所以参鉴棍法,深层原因可能是受“棍为短器之本”的武艺思想浸染。这种“以棍为本,通达诸技”的武艺思想,很有可能在壬辰倭乱时期通过明军教官东传朝鲜,宣祖就曾谕示:“曾闻天朝之言,木棍之技胜于长枪用刀云云,此技不可不习。”^[28]

与倭刀相比,《武艺诸谱翻译续集》收录的青龙偃月刀谱更是自成一体,意蕴深厚。其刀法共十一势,依次为龙跃在渊、新月上天、猛虎张爪、鸢鸟敛翼、奔霆走空、月夜斩蝉、霜鹤奋拳、五关斩将、介马斩良、龙光射斗、紫电收光。《武艺诸谱翻译续集》体现了朝鲜武艺思维从“模仿”到“创新”的转变,见证了中国传统武术文化在朝鲜从“传播”转向“交流”的升华,这种具有文化深度的创新是《武艺诸谱》难以企及的。

3 因创新而独特:英正时期(1724—1800年)朝鲜汉文武籍编撰的成熟

3.1 明清易代之后中国武术古籍在朝鲜半岛的传播

明清易代之后,中朝两国的书籍交流并未因朝代更替而断绝。清代的文化进一步繁盛,图书事业也突飞猛进,不仅前朝武术文献得到了很好传承,清代的武籍编撰也继往开来,达到新的历史高度。与此同时,朝鲜英祖(1694—1776年)和正祖(1752—1800年)均推行右文政策,在书籍交流方面用力颇勤,中朝书籍交流呈现繁荣景象。正祖专设阅古观储藏华本,建西序储藏东本,出现了华本和东本并峙

的状况,以至于正祖认为朝鲜藏书无所不包,无须再赴华购书,且朝鲜版本胜过中国版本^[29]。东传朝鲜半岛的中国武术古籍中,既有《武备志》《武编》《阵纪》等兵书,亦有《涌幢小品》《三才图会》等笔记与民用类书,还有《少林棍法禅宗》《内家拳法》等专门的武艺书籍^[30],为朝鲜学习武艺理论创造了有利条件,也为新一轮的朝鲜汉文武籍编撰奠定了基础。

3.2 《武艺新谱》:壬辰倭乱之后朝鲜武艺传承的历史见证

《武艺诸谱翻译续集》之后,朝鲜直至18世纪中期才再度尝试汉文武籍的编撰工作。英祖三十五年(1759年),朝鲜在庄献世子倡导下撰成《武艺新谱》。《武艺新谱》整理收录了朝鲜自壬辰倭乱以来的武艺技法,是《武艺图谱通志》编撰的基础,在朝鲜武籍编撰史上发挥了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这部武籍最初冠以《武技新式》之名,但在编撰《武艺图谱通志》时改称《武艺新谱》。关于《武艺新谱》的成书原因及其内容,《朝鲜王朝实录》有如下记载:“是年,颁《武技新式》于训局。按《宫中记闻》曰:‘小朝自幼时,志度已英爽,游嬉必陈兵威。上试叩其所存,有问辄条对甚悉。凡坐作进退缓急虚实之方,皆手划口授,无或差爽。又喜读兵家书,奇正变化之妙,无不默识精通。’孝庙尝喜武技,暇日御北苑,辄驰马试艺,所御青龙刀、铁铸大椎尚在储承殿,武士之有膂力者莫能运。小朝自十五六岁,已皆举而用之。又善射御,执矢发鹄,发必中心,临警飞鞞,悍馭亦驯。宫中相语曰:‘丰原筵奏,克肖孝廟之说,果有先见’云。至是,忧将臣之不闲武技,编成一书,名以《武技新式》以颁之。盖威光所载武技所传者只六技,曰棍棒、曰藤牌、曰狼筈、曰长枪、曰镗钹、曰双手刀,而演习之制多失其方,就旧书悉证正之。又以竹长枪、旗枪、锐刀、倭剑、交战月刀、挟刀、双剑、提督剑、本国剑、拳法、鞭棍凡十二技,创演为图,以示击刺之势,彙成全书,付之训局,使肄习之。”^[31]

这段史料交代了庄献世子编撰《武艺新谱》的主要原因:一是,其自小承继孝祖遗志,热衷武艺。二是,担忧武将不习武技,编书以示激励。三是,《武艺诸谱》只载六技,演习之制多失其方,撰未谱之技可防患于未然。还有韩国学者认为,庄献世子编撰《武艺新谱》之时与英祖关系已经恶化,和武官之间的对抗情绪也日趋紧张。《武艺新谱》的编撰,不仅

是对壬辰倭乱以来朝鲜武艺活动进行的整理与规范,更是庄献世子培养新兴武官阶层,缓解政治危机,打开孤立局面所进行的努力^[32]。

《武艺新谱》在《武艺诸谱》所载棍棒、藤牌、狼筅、长枪、镗钹、双手刀六技基础上,补充了竹长枪、旗枪、锐刀、倭剑、交战月刀、挟刀、双剑、提督剑、本国剑、拳法、鞭棍等十二种武艺,总共十八般武艺。或因庄献世子被废黜之故,《武艺新谱》后世未有流存,相关记载亦不多见,其内容可在收录庄献世子手书与教谕的《凌虚关漫稿》中窥得一斑。该书对《武艺新谱》所载武艺的来源、功用及新增十二种武艺的起止势法进行了介绍。特别是关于起止势法的信息,为我们了解其势法构成提供了重要信息。“竹长枪,凡七势,始于泰山压卵式,终于白猿拖刀式;旗枪,凡十六势,始于龙跃在渊式,终于夜叉探海式;锐刀,凡二十八式,始于举鼎式,终于金刚步云式;倭剑,凡八流,自土由流至柳彼流;交战,甲乙进退,自负剑至投剑,凡四十二式……”^[33]

将这段史料与《武艺图谱通志》所载武艺势法进行比较后发现,《武艺新谱》新增十二种武艺的势法数量以及起止势法名称与《武艺图谱通志》别无二致。由此可以推断,《武艺新谱》所辑武艺十八技是构成《武艺图谱通志》的主体。对此,《武艺图谱通志》亦言:“先朝已已,小朝摄理庶务,以竹长枪等十二技增为图谱,俾兴六技通贯讲习,事在显隆园志,而十八技之名始此……又以骑艺等六技复增为二十四技。”^[22]言明《武艺图谱通志》二十四技,是在《武艺新谱》十八技基础上增补骑艺等六技而成。

3.3 《武艺图谱通志》:独具特色的朝鲜汉文武籍扛鼎之作

尽管《武艺新谱》在朝鲜武籍编撰史上的作用举足轻重,但由于未有流存,其详细内容、武艺思想,以及与中国武术古籍的关系难以考据。因此,考察明亡清替之后中国武术古籍对朝鲜汉文武籍编撰的影响,只能依托《武艺图谱通志》这部汲取中、日、朝三国武艺精华的扛鼎之作。

《武艺图谱通志》成书于正祖十四年(1790年),由奎章阁检书官李德懋、朴齐家,以及壮勇营枪剑哨官白东修遵照正祖旨意编撰而成。正祖编撰《武艺图谱通志》主要出于以下原因:一是,完善军事教材。就18世纪的朝鲜对外关系而言,北方女真部落

的威胁比倭寇更大,《武艺图谱通志》在《武艺新谱》基础上追加马上武艺内容,体现了针对女真部落进行的军事战略部署。二是,推行政武振兴策略。正祖即位之初就着手军制改革,将军事权力中心转移至壮勇营,并着手编撰《兵学通》作为军事操练指导书。《兵学通》成书之后,编撰符合其练兵要求的武艺教材,实现以“《兵学通》为营阵之纲领,《武艺通志》为技击之枢纽”^[17]的体用互需,成为朝鲜亟待完善的问题。三是,彰显改革决意。《武艺图谱通志》的编撰,能够凸显正祖改革决心,强调奎章阁(文治)和壮勇营(武治)作为国家核心统治机构的重要地位。四是,阐扬其父尚武遗志。正祖幼年目睹了其父庄献世子因党派之争被废黜赐死的经历,完善《武艺新谱》不仅可以寄托思悼,还能彰显儒家孝道,为巩固王权制造良好舆论。

《武艺图谱通志》的编撰始于正祖十三年(1789年)秋,于次年四月完成。从同时期的《兵学通》耗时九年成书,而《武艺图谱通志》不到一年付梓的对比来看,正好印证了《武艺图谱通志》是在《武艺新谱》基础上进行增补与完善的推断。并且,增补的马上武艺内容,在此前就已撰成的《万机要览》和《经国大典》中均有体现。

《武艺图谱通志》有其独特之处。首先,其武艺分类方法自成一格。《武艺图谱通志》由四卷构成,其卷次按刺、砍、击的技法进行分类。“兵技不出刺、砍、击三法。故今以枪、刀、拳三技为首,各以类从。交战出于倭剑,因以附之。马才近于击球,次其下。骑步冠服图说又次之。”^[22]卷一为“刺”的武艺,辑录长枪、竹长枪、旗枪、镗钹、骑枪、狼筅等六技。卷二为“砍”的武艺,由双手刀、锐刀、倭剑、倭剑交战等四技构成。卷三同为“砍”的武艺,有提督剑、本国剑、双剑、马上双剑、月刀、马上月刀、挟刀、藤牌(附腰刀、标枪)等八技。卷四为“击”的武艺,有拳法、棍棒、鞭棍、马上鞭棍、击球、马上才等六技。虽然《武艺图谱通志》的编撰以《纪效新书》和《武备志》为标准,但这种独树一帜的分类方式并不同于两书,其他中国武术文献也难觅先例。传统的武艺分类,多按长兵和短兵进行区分,但随着火药武器的出现,这种传统分类的意义被逐渐弱化。因为较鸟銃、火砲而言,之前类属长兵的狼筅、长枪等武艺再称之为“长兵”就略显牵强了。并且,《武艺图谱通

志》也没有按照兵种属性对武艺进行分类,增补的马上武艺被归于“击”的类属。这种刺、砍、击的分类方法,很有可能是为了突出武艺技击特点,使操练过程更具针对性和方向性。其次,《武艺图谱通志》辑录的武艺内容以满足军队操练为基础,而同时期的中国武籍编撰大多已脱离军事范畴,且鲜有汇集多种军事武艺成一书者,朝鲜将军事武艺书籍作为单独的体系进行书写,其意义不言而喻。最后,《武艺图谱通志》旁征博引、博古通今,内容丰富翔实,涉及中、日、朝三国武艺,对武艺二十四技的历史、价值、势法以及兵器制式、种类的记载细致入微,其广泛性、综合性和全面性出类拔萃。这些独特之处,反映出在中国武术古籍滋养下,朝鲜武艺创新能力不断提升,武籍编撰的思想和方法亦更加成熟。

中国武术古籍在《武艺图谱通志》编撰过程中的价值。首先,引用书目绝大多数源自中国。《武艺图谱通志》共例举145部参考书目,其中朝鲜13部、日本3部,除几部书籍出处不详外,其余皆为中国文献。参考的中国书籍涵盖经、史、子、集等,可谓兼容并蓄、旁征博引。其次,正如《武艺图谱通志》所言“戚继光《纪效新书》、茅元仪《武备志》俱为此书之表准”^[22],其武艺势法、编撰格式及势法图示均以两书为参照。《纪效新书》所载棍棒、藤牌、长枪、镗钯、狼筈、双手刀六技的武艺势法被《武艺图谱通志》全盘吸纳,其中“直符送书”“大当”等势法名称,亦被运用于其他武艺。最后,《武艺图谱通志》继承了中国武术古籍的武学思想。如戚继光在《纪效新书》中强调“立正法,禁花法”“凡武艺,务照毅习实敌本事,真可搏打者,不许仍学花法。”^[34]这种强调技击实效的武艺观深受朝鲜推崇,《武艺图谱通志》亦言:“以此杀手诸技迄无其谱,学之者徒信其目,故正法日废,花法作矣。……自今其所试武艺,一依此谱,则虽或不中,亦必不远花正,由此而可辨庶不为虚套之所欺矣。”^[22]此外,《纪效新书》主张长短兵器相救互补的观点,同样被朝鲜所吸纳。在论及长短兵器关系时,《武艺图谱通志》强调“牌筈枪钯棍剑及鸟铳弓矢之技,虽有远近之殊,其所以杀贼一也。近技之不可施于远,远技之不得用于近,是皆理,势之所必然者也。”^[22]这些传统武术文化的思想精髓,随着中国武术古籍东传朝鲜,在朝鲜半岛武艺发展史上留下了永恒的烙印。

4 结论

朝鲜汉文武籍编撰经历了从引入到模仿,由模仿至创新,因创新而独特的发展历程。其成果有壬辰倭乱时期刊行的《武艺诸谱》(1598年),壬辰倭乱之后编撰的《武艺诸谱翻译续集》(1610年),英祖时期庄献世子主导下完成的《武艺新谱》(1759年),以及正祖时期成书的《武艺图谱通志》(1790年)。朝鲜汉文武籍编撰具有强烈的军事色彩,主要目的是完善朝鲜的武艺操练教材。中国武术古籍东传,是朝鲜汉文武籍编撰的前提与基础。《武艺诸谱》是朝鲜效仿浙兵操练规制,模仿十四卷本《纪效新书》的结果。《武艺诸谱翻译续集》是为完善防胡御倭的练兵教材,基于十八卷本《纪效新书》和《练兵实纪》《万宝全书》所进行的创新。明亡清替之后的百余年间,《武备志》《少林棍法禅宗》《武编》《三才图会》等中国武术古籍相继东传,为《武艺新谱》与《武艺图谱通志》的编撰创造了条件。可以说,朝鲜汉文武籍编撰史,实际上就是一部中国武术古籍的东传史,其引入、模仿、创新、成熟的发展历程,是以中国武术古籍东传为历史坐标。朝鲜汉文武籍是中国传统武术文化孕育出来的异域奇葩,是中朝武艺交流的结晶,更是中国武术文化源远流长、泽被四方的历史见证。

参考文献:

- [1] 孙卫国. 东亚视野下的中国史学史研究[J]. 史学月刊, 2013(11): 91-100.
- [2] 王岗, 陈保学, 马文杰. 新时代“文化自信”与中国武术的“再出发”[J]. 北京体育大学学报, 2018, 41(8): 9-16.
- [3] 朝鲜王朝实录: 12册·中宗实录: 卷23[M]. 首尔: 国史编纂委员会, 1986.
- [4] 马明达. 略论武术古籍与武术文献学的建立[J]. 体育文史, 1999(6): 41-43.
- [5] 李吉远, 谢业雷. 明代武术的发展——基于武术古籍的研究[J]. 体育学刊, 2015, 22(1): 113-117.
- [6] 朝鲜王朝实录: 18册·中宗实录: 卷96[M]. 首尔: 国史编纂委员会, 1986.
- [7] 朝鲜王朝实录: 25册·宣祖修正实录: 28卷[M]. 首尔: 国史编纂委员会, 1986.
- [8] 孙卫国. 《纪效新书》与朝鲜王朝军制改革[J]. 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8(4): 116-129.
- [9] 葛业文. 《纪效新书》十八卷本与十四卷本的相互关系[J]. 滨州学院学报, 2014, 30(4): 24-28.
- [10] [韩]郭乐贤. 朝鲜后期《纪效新书节要》研究[J]. 东洋古典研究, 2011, 42(2): 355-377.

- [11] 朝鲜王朝实录:22册·宣祖实录:42卷[M].首尔:国史编纂委员会,1986.
- [12] [明]戚继光.纪效新书(十八卷本)[M].马明达,点校.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1988.
- [13] 李晓艳.《纪效新书》的刊行与武术内容考[J].浙江体育科学,2012,34(4):20-27.
- [14] [朝鲜]崔起南.武艺诸谱翻译续集[M].大邱:启明大学出版社,1999.
- [15] 李吉远.明代武术史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
- [16] 朝鲜王朝实录:22册·宣祖实录:62卷[M].首尔:国史编纂委员会,1986.
- [17] 朝鲜王朝实录:22册·宣祖实录:48卷[M].首尔:国史编纂委员会,1986.
- [18] 朝鲜王朝实录:22册·宣祖实录:61卷[M].首尔:国史编纂委员会,1986.
- [19] [明]宋应昌.经略复国要编:卷10[M].台北:华文书局,1968.
- [20] [朝鲜]李颐命.韩国文集丛刊·疎斋集:卷10[M].首尔:民族文化推进会,1996.
- [21] [朝鲜]李德懋.青庄馆全书:卷24[M].首尔:民族文化促进会,1980.
- [22] [朝鲜]李德懋,朴齐家.武艺图谱通志:卷1[M].首尔:韩国体育史研究会,2002.
- [23] 朝鲜王朝实录:23册·宣祖实录:112卷[M].首尔:国史编纂委员会,1986.
- [24] 朝鲜王朝实录:23册·宣祖实录:97卷[M].首尔:国史编纂委员会,1986.
- [25] 朝鲜王朝实录:25册·宣祖实录:182卷[M].首尔:国史编纂委员会,1986.
- [26] [朝鲜]韩峤.练兵指南[M].首尔:民族文化推进会,1996.
- [27] [明]戚继光.纪效新书·拳经捷要篇[M].盛冬铃,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6.
- [28] 朝鲜王朝实录:24册·宣祖实录:124卷[M].首尔:国史编纂委员会,1986.
- [29] 黄修志.书籍与治教:朝鲜王朝对华书籍交流与“小中华”意识[J].世界历史,2018(1):49-64.
- [30] 蔡艺,郑燕.中国武术古籍在朝鲜半岛的传播与影响[J].武汉体育学院学报,2020,54(8):51-56.
- [31] 朝鲜王朝实录:46册·正祖实录:59卷[M].首尔:国史编纂委员会,1986.
- [32] [韩]朴宏阁.朝鲜时期军事训练机构训练院的成立过程和职责[J].军史,2001,43(2):205-232.
- [33] [朝鲜]李愔.韩国文集丛刊·凌虚关漫稿:卷7[M].首尔:民族文化推进会,1996.
- [34] [明]戚继光.纪效新书(十四卷本)[M].北京:中华书局,2001.

作者贡献声明:

蔡艺:提出论文主题,设计论文框架,执笔撰写;
赵剑平:设计论文框架,收集文献,修改定稿;张银行:
修改完善。

The Eastward Spread of Ancient Chinese Martial arts Books and the Compilation of North Korean Martial arts Books in Chinese

CAI Yi^{1,2}, ZHAO Jianping³, ZHANG Yinhang⁴

(1. PE Postdoctor Working Station,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Fuzhou 350108, China; 2. Physical Education School, Hunan Technology University, Zhuzhou 412008, China; 3. College of Physical Education, Xiangnan University, Chenzhou 423000, China; 4. Yangzhou University Sports Institute, Yangzhou 225127, China.)

Abstract: The study of Chinese martial arts books spreading in extraterritorial areas is an important reference to clarify the transmission path and communication history of the culture of Chinese traditional martial arts. Based on the documentary analysis and historical research of ancient North Korean historical materials, it can be concluded that the compilation of Chinese martial arts in North Korea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eastward spread of Chinese martial arts. The compilation of Chinese Ancient Martial Arts Books in North Korean has experienced a unique development process from introduction to imitation, from imitation to innovation. The clear relationship between ancient Chinese martial arts books and martial arts books of North Korea in Chinese could clarify the headstream position of Chinese traditional martial arts culture in East Asia, and it can be used for reference to the transmission history of Chinese martial arts, the communication history of martial arts between China, North Korea and other East Asian areas.

Key words: history of martial arts; Chinese martial arts books; North Korea martial arts books in Chinese; *Action Diagram of Martial Arts*; *Translation Sequel of Action Diagram of Martial Arts*; *General Record of the Action Diagram of Martial Arts*